

# 当下流行“过度病”

当下社会,好像做什么都要过度。

食用品种,就有包装过度。茶叶,偌大个沉甸甸的纸箱子里套个木箱子,木箱子里面还有包装袋,打开铁箱子里面还有包装袋,扒开袋,其实也就三两茶叶,真可谓“一斤螺肉八斤壳”。小食品,过去论斤包装,现在论粒儿包装,一粒蚕豆大的牛肉干就是一个独立包装,食用时让人觉得这根本不是吃牛肉,仿佛是吃神仙肉,金贵得不行。搞汽车促销要靠惊艳美女包装,这本已过度,但更过度的还是她们充分暴露的皮肉。

一眼看不透的过度就更多。比如教育过度,可怜的孩子们在娘肚里就开始听音乐,一说话就学英语,一识数就学奥数,一认字就背古文;书包不是背着走,而是地上拉着走,每周课程安排最好能有星期八。看病治疗过度,治个感冒也要拍X光片、做CT;治个牙痛,又是照光,又用激光,直到把几个月工资花光。

还有不易被人意识到的过度。近年来,公司职工登楼事件不断,知识精英中年早逝不断,妇女怀孕流产不断,许多人以为这是现代社会人们心理承受能力太弱。错,实乃社会普遍对利益无节制的追求而导致劳动过度。凭劳动时间和强度,将“勤劳勇敢”的13亿中国人集体誉为世界劳动模范,绝对当之无愧。一篇本来习以为常的文章刊发,并无指桑骂槐,却也被人拿来大做文章。何致如此?过度敏感,过度反应,过度解读。现在办个什么国际性

会议或赛事,或逢什么节日,都不惜抄出家庭搞晚会,看上去热热闹闹,大长我中华雄风,其实往细处想,晚会烧钱多就说明强大吗?焰火放得高就说明崛起了吗?此乃欢庆过度。

没有人愿意把事情做过度,过犹不及,劳民伤财,可有人就是喜欢过度。毫无疑问,利益驱动是罪魁祸首。如果不是为钱,谁愿意把感冒当癌症治;如果不是为钱,谁愿意给你的孩子办那么多课外班。过度做法的背后便是绝对过度的利益,在过度的利欲驱使下,各种过度开发、过度开采、过度利用、过度掠夺行为层出不穷。它无疑给人们造成对健康的过度损害,心理的过度疲劳,未来的过度透支。

过度的背后也是因为浮躁。阿Q刚刚赚了几个小钱,便牛哄哄地把钱往酒店柜台上一扔,“现钱,拿酒来”。未庄人的造反刚闹风声,他便在土谷祠里幻想着先杀了谁,随后睡哪个女人更好。过度地宣扬,过度地庆贺,过度地渲染盛世景象,其实正是阿Q扔钱那一刻的心态。有了几个小钱,心中就像打了十八只小兔子,惴惴不安,大肆显摆,过度花销。

当今“过度”这一流行病,伤国体,损国气,逆民意,蚀民魂。要有所医治,只能靠立章建制,靠依法治国,靠营造正常的社会秩序,让一切按事物客观规律运行。如此,我们不仅有可能可持续发展,也会减少因“过度”而给社会带来的痛楚。(摘自《同舟共济》2012年第8期 张阳心/文)

(摘自《读天下》2012年15期 张涛甫/文)

□□□□□  
对任何社会的执政者们来说,从古至今,最重要的一个任务、一个功能,就是维护社会稳定,换句话说,就是维护政权安全。当一个政权作为不良的时候,“暴力革命”就会不断出现,因此我们历史上的“农民起义”也就特别多。

这些“农民”都是因为什么原因走上这条道路的呢?稍加统计,发现有那么几类。

第一类是下岗失业的,比如李自成。他走上工作岗位后,先后干过佣工、铁匠和驿卒,虽说工作并不好收入也不算高,毕竟一直有差事做。后来“被裁鱿鱼”,没法糊口了,只好走上起义这条路。所以,下岗职工,是社会不安定因素之一。

第二类是求学无门的,比如黄巢。黄巢他们家历代做私盐买卖,属于体制外的富人,衣食肯定不是愁的,社会不稳定对他影响也不很大,按理这样的中产阶级是最稳定的一群人。但架不住他志向远大,为了有更大的发展,他年年都参加科举考试,但也不知道是他学艺不精还是当时教育腐败太厉害而他没有后台,他考了很多年都没考中。接连不断的受挫终于让他仇恨社会。

第三类是宗教人士,比如张角和洪秀全。他们俩都是一开始就受到某种宗教的鼓舞,然后很理想主义地要把福音传递给全社会的兄弟姐妹,然后受挫,然后走极端,然后就反政府了。

第四类是没想享受到社会保障的人,比如明末的女英雄唐赛儿。她本来是个本分民女,全家靠种地为生。有一年发生旱灾,当地颗粒无收,唐赛儿的丈夫和一群同乡去官府申诉低保,没申请到还被官府给打死了,于是把未亡人唐赛儿逼上梁山。

第五类是完不成政府摊派的低级公务员,比如陈胜吴广。遇上大雨阻路,行将误期,按照国家法律将获死刑,没办法只好反了。所以法律和规定要考虑到不可抗力,且保留申诉渠道,否则一定会逼出社会不安定因素。

第六类是司法不公的受害者,这方面的例子就太多啦也太简单啦,就不说了。

第七类是贫富差距太大导致心理极度失衡的下层人民,比如北宋末年的王小波、李顺,就手持均富卡,振臂一呼,一大帮不平等的人就响应了。

上面说的这些“农民”,其实都没有真正夺取政权建立新社会,他们只起到了打破旧社会以及宣泄底层人民不满的目的,在他们的时代,真正起了作用的都是掌握军权的大亨们。所以,社会最不安定因素是既得利益者,他们得到了一个,就想得到更多,而且他们也有能力如此。既要防腐底层人民掀起乱局,又要防高层人士利用乱局,政府的担子,还真重呢。

(摘自《读天下》2012年16期 宋燕/文)

## 中国运动员与“机器人”

英国跳水神童汤姆·戴利说,中国运动员“不上学,也不和家人在一起”,而是在一条跳水运动的传送带上,一直工作到损毁,然后下一个再出来。戴利还评价了中国运动员“他就是个机器人,或者说他是出了名的机器人”。

戴利对中国运动员的观感和评价是否体现什么意图,这是一回事,戴利的观感和评价是否真实,则是另一回事。这里的真相,可以两方面视之。一方面,这是是否是他的真实看法;另一方面,他的看法是否符合事实。言论是否他的真实看法,涉及他在接受采访时是否诚实地表达了自己。一般地说,我们不会猜测他歪曲自己的内心,言不由衷地面对媒体。于是,他的言论是否符合事实,就只涉及到他是否了解中国运动员的真实状况,而跟“不怀好意”、“别有用心”之类在道德品质上的劣评没有关系。

那么,戴利说中国运动员“不上学,也不和家人在一起”,是不是事实呢?一般地说,这是事实。中国运动员确实大多不和家人在一起,训练和比赛紧张之时,运动员家里有人逝世,甚至都不通知运动员,这还往往被当成佳话。中国运动员“不上学”,这也大致上没有疑问,“他们没有了真正的生活,我认为跳水不该是这样的”,“他就是个机器人,或者说他是出了名的像个机器人”,这都是评论性的说法。戴利说中国运动员没有了真正的生活,中国运动员说我们这也是一种生活。这是对生活的不同理解,可以各说各话吧,但戴利说的生活,应是更加符合普通人的定义。戴利说“跳水不该是这样的”,中国运动员可能说“跳水也可以是我们这样的”,甚至“跳水本来就是这样的”,这既涉及到对跳水运动的理解,也涉及到对运动与生活的关系的理解。

邱波对戴利作出了反驳:“怎么可能是机器人!我们也有我们的生活,也有学习,有自己的空闲时间和娱乐。”

反驳可以理解,甚至是可取的,显示了戴利对“生活”的不同理解。不过,特殊的体育,特殊的生活,带给运动员特殊的人生,极少数人登上了顶点,为国增光又耀门庭,他们是全民宠儿,而绝大多数人退役后难以具备职业竞争力,他们的未来不无忧虑。

(摘自《新民周刊》2012年29期 刘洪波/文)

## 解构,但不嘲弄一切

大概十多年前,我看到这样一个笑话:爷爷抱起孙子,给他讲人生的道理。讲完后,爷爷问孙子有什么感想。孙子说,爷爷你嘴好臭。

后来,我把这个笑话当作一个关于解构的故事写进我的文章里,以此诠释这个解构的时代。在这样一个时代,我渐渐开始厌恶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:在那里解构、赏玩与戏仿主导了一切,没有灵魂的庙宇,没有神圣的存在,没有理想的生活,更没有人会为崇高与尊严而战。在那里,人心必须接受

大张旗鼓的嘲弄。

解构与嘲笑成了这个社会的主旋律。但是,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,不可能只有解构,而无建构;只有瓦解,而无粘合;只有自由,而无责任。没有敬畏,没有尊敬,没有神圣,没有向上的力量。

事实上,就连解构主义思想家们也承认,并非所有东西都当被解构。德里达便提出了“正义的不可解构性”,因为“正义”是对他者的无条件的义务或者说是责任,是一种“非对称的责任”。从逻辑上说,如果一切都是可以解构,解构也将归于虚无。

好了,接下来让我们重新回到上面那个笑话。如果那个小孩对任何说话者都抱之以“你嘴好臭”,而且小孩成了大多数,这个世界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呢?而今网络上,谁还敢高扬理想的旗帜,而严肃的讨论不就都以哄堂大笑收场?

解构,但并不嘲弄一切。可现在人们只是自顾自站在各自的脚盆里,只有嘲弄,没有敬畏;只有哄堂大笑,没有热泪盈眶。

(摘自《中国新闻周刊》2012年28期 熊培云/文)

## 那事 我在“文革”中的出走事件

冒充西园寺公一之子  
关恩谦,“文革”中的著名“叛国者”。他1953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,分配到中央财政部苏联专家工作室,曾为中央领导人陈云、邓小平、薄一波做过翻译。1957年被定性“中右”分子,1958年“充军”青海改造。1962年调回北京,在“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”负责对外联络工作。1968年,仅仅是忘忠于第二天“红卫兵”针对自己的批判会,他竟失心疯地从单位偷了日本友人的护照,冒充外宾偷逃出国。后来,他在联邦德国获得博士学位,登上汉堡大学的讲台,并与一位德国姑娘海佩春结婚。1981年,有关部门摘去他头上的“叛国”罪名,此后,他开展了大量的中外交流工作。从1985年起,他先后被四川外语学院、杭州大学、浙江大学等多所院校聘为兼职教授。



## 出走事件

二话没说,“砰”地一下就把“免检放行”的戳子打在早就填好的行李单上。第二道关卡是把护照交给边防警察。碰巧那天正值的是个新来的年轻边防警察,从未和我打过照面,我把护照交给他后,从容地起身到了地下室的厕所,脱下制服,塞到抽水马桶上端的水管箱后头,掏出早就准备好的花领带,熟练地打上。不一会,从隔间里走出来,俨然是一个穿西装、打领带、戴着黑框眼镜,还挂着一个在北京防风沙常用的防尘口罩的“外国绅士”。

一直等到起飞前十分钟,那个新来的边防警察还没把护照还回来,我快崩溃了。

就在这时,一位边防警察向我走来。我看清楚来人的长相后,心里叫苦不迭,因为来人居然是和我经常拍肩膀开玩笑的熟人老刘。

老刘用英文问我这是不是我的护照时,我竭尽全力克制住声音的颤抖,镇定自若地用英语回答了老刘的问题。再一次化险为夷。

现在就剩登机这临门一脚了。三个登机口的门边,都有两个女服务员把守着。这些女孩子,我几乎都认识。只要她们中间的任何一个认出我来,这场戏就算砸锅了。我正踌躇不前之际,广播响了:“有首长到了,所有工作人员立即到二号门夹道欢迎!”女服务员一撤,我瞅准这个机会,迅速穿过无人把守的登机口,跑上了停机坪上一架苏联造的小型客机舷梯。

## 最终落脚西德

西园寺公一的护照上有法国和埃及的签证,我凭着自己多年的外事经验,选择了飞埃及,因为当时埃及和中国尚未建交,不存在遣返的问题。在埃及被以“非法入境”的名目关押一年多后,德意志联邦共和国(即西德)同意我暂时滞留。

悬在半空的我终于时来运转,够着地了。

(摘自《浪:一个叛国者的人生传奇》关恩谦/著)

## 逃离,一个纯粹的奇迹

硬泡地求着工作上素有往来的熟人老王盖了出境章。马不停蹄地回到单位财务科领支票,正到处抓我把柄准备斗我的科长一见我进门,就像见了鬼似地扭头走了出去。我内心一阵狂喜:“老天实在太眷顾我了。”因为,只要科长公事公办,稍微核对一下,事情马上就会暴露了。而科长的躲避正好给了我机会,抓着不明就里的出纳开出了支票。取机票也出乎意料地顺利。

在诸多谎言和巧合的催化下,我用了三个小时,办完了平至少需要三天才能办完的事。

当晚回到家,见到年迈的母亲和年幼的儿子,我再一次撒了谎,哄母亲去了姐姐家,又打发妻子美珍带着儿子去亲戚家借住几天。安顿好一切,憋到夜深人静、独处一室的时候,我拿出西园寺公一的护照仔细审视起来,也不知是不是做贼心虚,越看越觉得照片里的人和我完全不像。我决定把原来的照片揭下来,换成自己的照片,还用手指甲在照片上掐了个钢印的轮廓上去。

## 逃离,一个纯粹的奇迹

第二天,我外面套了件蓝制服,里面穿着全套西装,到了机场。候机大厅冷冷清清。我刚一现身,办理外宾出境手续的海关检察员小金大老远就热情地跟我打招呼:“小关,送外宾啊!”我“随意”地将大箱子往行李台上一放,镇静自若地答道:“是啊,西公的儿子出国。”小金一

## 那年

在著名作家魏巍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一文中写到的十分惨烈的松骨峰战斗牺牲的烈士中,有近一半是湘西去的“土匪”。原47军139师政委晏福生曾说过:这些湘西“土匪”特别能打仗。

“你帮我选批土匪充军去”

1950年底剿匪基本结束。1951年三四月份,我调回沅陵公安局,上级让我到沙树流分监监狱。当时监狱里关了1047个土匪,该处决的处决后,还剩1000个左右。不记得具体是1951年哪月哪天,沅陵公安局局长刘松林找到我,给我交代任务:你帮我找批身体健康、罪恶不大的,准备充军去(开始是喊充军,后来改了,也喊参军)。

我领到的第一套军装已经是最小号了,可还是大得像麻袋。我那时的个子不到一米五,还没发育呢,可只有大人的军装给我穿。我记得妈妈帮我把脚腕挽进去好多,才算勉强走路不绊脚。

进了八一队,就从你校的半天上课、半天训练变成了全天训练,读书的时间很少,训练也比体校更专业。在八一队的前两年,我整天活在自己的世界里。很多人夸我,觉得这小孩不错。我练得也挺用心,进步很快,又是左手持枪,自我感觉非常好。

但现实根本不是我想的那样。1996年、1997年的全国青年锦标赛,我基本上就在第6到第8名之间徘徊,并没有一出道就拿冠军,根本没有甚至有的时候连小组赛都没出线。

这时候我才发现,前一年我还觉得自己多么了不得,可突然之间,我感觉自己正离国家队的大门越来越远。

(摘自《直到世界尽头》林丹/著)

## 我选送

在著名的魏巍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一文中写到的十分惨烈的松骨峰战斗牺牲的烈士中,有近一半是湘西去的“土匪”。原47军139师政委晏福生曾说过:这些湘西“土匪”特别能打仗。

向明也确实是个角色,到朝鲜战场作战非常勇敢,立了战功,取得了军籍。他后来是作为军复员回来的。

顶替土匪弟弟上朝鲜,当上了营长。1950年冬天,有个二十六岁的人来自首,说他是治平乡(以前属沅陵,现在属张家界永定区)的土匪某某某(我模糊记得他姓张,具体什么名字我忘了)。这个人后来被送到了沙树流监狱。

我看这个人样子蛮老实,不像他自首时说的那么坏,提审他,问他有没有血债。他一五一十地告诉我以前在哪里杀了谁。

我第一批选了百多个,送到火神庙(现在的沅陵拘留所)学习了3个月后,把他们送到驿码头。这一批送走后,又要选。后面又选了两批。经我手选了370多个。最后那批70多个送到北京后没继续入朝了——朝鲜战争已经结束。这70多人最后送到了北京清河农场。

“未必会投降美国人,估计他民族感还是有的”

我选的人要符合这几个要求:罪恶小、没什么民愤,身体好,打仗方面有一技之长。

送选的人中,有个叫向明的,对我印象很深。向明是张平手下的一机枪手,中队长,有7条人命(死在他手里),本来是要杀的。他个子高大,身体好。他是我和战友一起抓的,我晓得他是个很好的机枪手,人才难得。想来想去,始终觉得杀他不如把他送到朝鲜战场去。

我跟局长讲:这个人民惯大是大,

(摘自《成功》2008年第10期 杨先树口述 刘建勇整理)